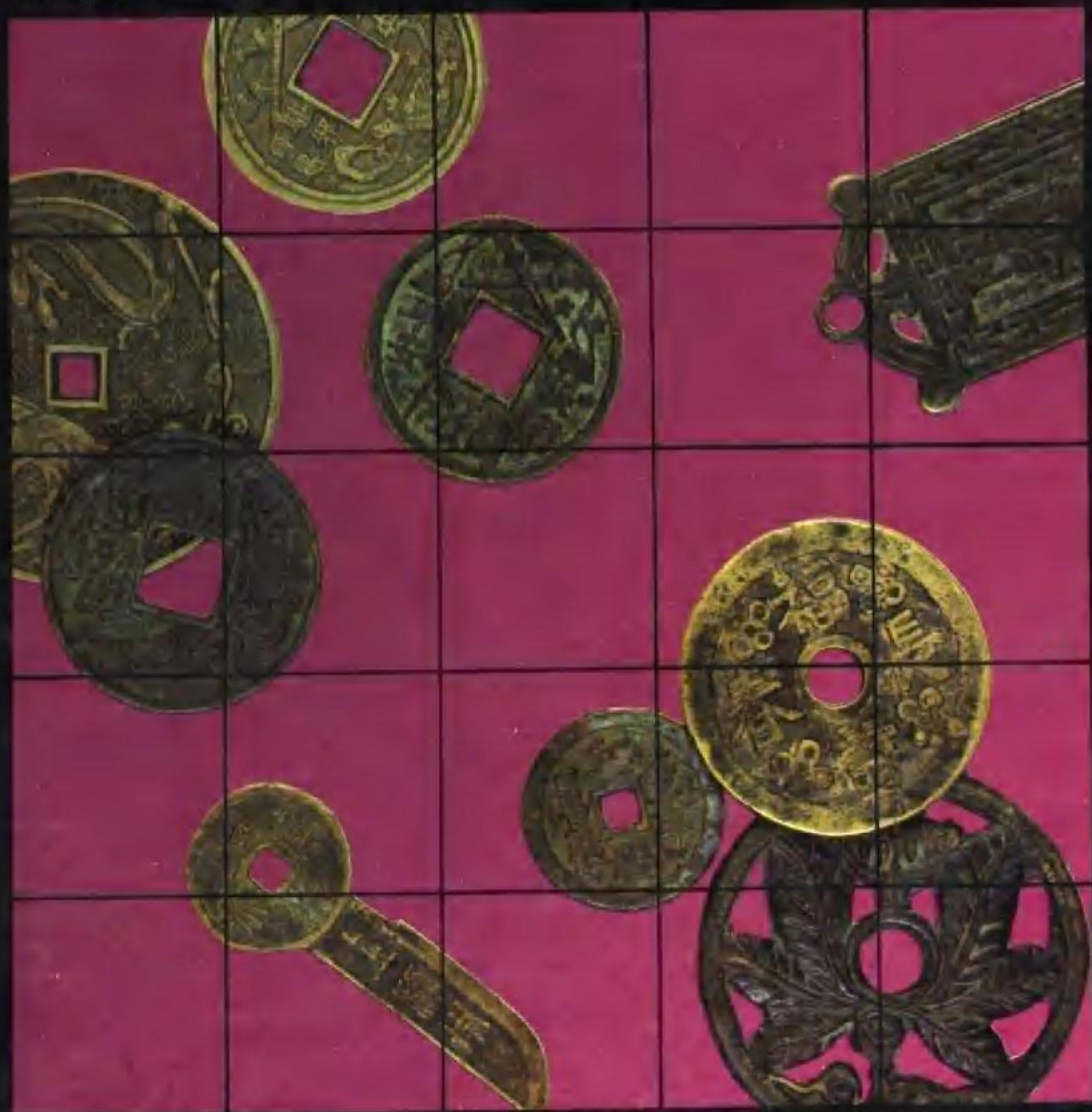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花钱

余榴梁 徐 渊 顾锦芳 张振才 编著

Zhong guo hua qian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余榴梁 徐 淵 顧錫羣 張振才 編著

沪新登字109号

责任编辑 王立翔
封面设计 王伟

中国花钱

余榴梁 徐渊 顾锦芳 张振才 编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七厂一分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37 插页5 图509面 字数 70,000

1992年7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3次印刷

印数: 10,001—20,000

ISBN 7-5325-1220-7

K·116 定价: 24.00元

序 言

数日前，余榴梁、徐渊两君携来厌胜钱集拓一批见示，拟供出版，嘱予为序。

余、徐两君均酷爱古钱，勤奋好学。早在一九八二年，即与几位同好一起，业余上门助予整理万拓楼集藏之“泉币大观”资料。虽人多室小，条件甚差，仍不避寒暑，埋头工作，钻研探讨，乐在其中。他们还另抽时间编辑《泉币之友》，由徐君手刻，余君油印，众人动手，装订成册，分赠各地泉友，一时颇获好评。上海市钱币学会成立，两君均任理事，一起参加学会“通讯”之编排印刷，亦卓有成绩。余君致力泉币搜集，藏品逾万，多次参展；徐君长于泉学研究，近几年来，新作不断。数年前，两君即已有编纂厌胜钱图谱之议。经与泉友顾锦芳、张振才通力合作，广征博采，终于粗具规模。一一翻阅，果然琳琅满目，洋洋大观，诚不易也。

厌胜钱亦称压胜钱、押胜钱，因大多有图案花纹，故民间俗称“花钱”。厌胜钱之出现，当不迟于西汉，历代官方与民间均有铸造。厌胜钱之本义，当指以厌禳为目的而特制之迷信物，但后来人们所指范围愈来愈广，凡不作流通钱币之“非正用品”，诸如辟邪、避兵、开炉、镇库、吉语、祝寿、生肖、八卦、春钱、棋钱、打马、撒帐、缕花、戏作、赏赐、凭信、八仙、选仙、庙宇、供养、挂灯、上梁、冥钱、瘞钱等等，均泛称之为厌胜钱。其材质多样，形状各异，大小悬殊，用途亦各不相同。虽一般不作流通之用，但因其具钱形，向亦为古钱藏家所青睐，自存世最早之南宋洪遵《泉志》，迄丁福保《古钱大辞典》，多有收录。唯各谱多以历朝古钱为主体，厌胜钱仅取若干代表之品种附后，聊备一格，即以收录称博之《古钱大辞典》，厌胜钱亦仅二百余品，缺漏甚多。余、徐等君之集拓，已有一千八百余种，远胜历代各谱。且有等级评定以示其多寡优劣，并拟将近年陆续发表有关厌胜钱之专文揉合增补成《概说》列于谱前，供研究厌胜钱作参考。如能付梓，定能为钱币爱好者所欢迎。

予集藏研究钱币已五、六十年，对历代厌胜钱素亦重视。其虽不属正用品，不能以“货币”视之，但以“文物”称之，则当之无愧焉。细审历代厌胜钱，各种书体具备，图案内容丰富，涉及历史、地理、宗教、神话、风俗、民情、文化、娱乐、书法、美术、工艺等等各个方面，深入研究，变“无考”为“有考”，其间大有学问。近几年来，予曾写过《象棋古钱》、《义和团团钱》、《为淳化佛像金币正名》、《飞龙进宝析》等文，颇有一点体会。但对于数量巨大之厌胜钱，仅只是稍作涉及而已。

予万拓楼钱拓藏有数万，厌胜钱之精品亦有一定数量。已出版之《太平天国钱币》与正在编纂中之《咸丰钱汇》，均收有多种厌胜品。唯因居室搬迁之后，堆放杂乱，拣选困难，加

上即将出国访问，暂无精力全面查找，且先将手头三百余枚厌胜钱拓提供余、徐诸君，如能使该集拓在出版时稍有增色，则予之愿已达矣！

马 定 祥

庚午年夏识于万拓楼

弁 言

余榴梁、徐渊两君从事研究中国古代钱币历有年所，近几年中合作发表论古币文章甚多，时承邮寄授读。予深为钦佩二君勤奋治学毅力，既着意于实物搜集，又博探史志和时人著述，以钱币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证古币不遗余力，是以精求索微，每有超越前贤高见，盖合作共济，相得益彰者。其于历代压胜等类花钱致力尤勤，厥有所得。喜闻近与泉友顾锦芳、张振才合编巨著《中国花钱》书稿成，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付梓。

窃以压胜钱起源于汉代。在汉五铢钱中，尝见有立人、鱼、刀等图像和“君宜侯王”等文字。同类图像初见之于先秦尖首刀币，乃钱币中象形古文，而在战国后期铸币上亦偶有吉祥语辞，皆为后世压胜钱嚆矢。观乎周秦汉三代所遗之印玺、铜镜、瓦当，率多取龙、虎、鸡、羊、鱼、龟等图形作图案画。顾以风尚传习，此种习俗亦反映在铸币中，唯为时稍后耳。汉代民俗简朴，喜以吉祥富有致语，爱好象征和平物象。所见著录和传世之西汉、新莽铸币以及钱范中，有“大吉”、“日入千金”等文字，别有钱范铸象征福禄之鹿、鱼图象。此类器物，当属大力者所为，或铸工一时专作，意非政令使然。由知压胜钱，至迟滥觞于西汉末造也。自魏晋以降，历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以至民国初期，上下两千年间，花钱品类繁演，文字与图画丰富多彩、各臻其妙。从吉语、祝辞、辟兵、压邪、朱雀玄武、北斗七星、十二生肖、将马、人物故事、花卉图、儒家箴言、释家语录到供养钱、符咒钱、秘戏钱等等，可谓包罗万象，无所不有。此类花钱，不论制作精粗，内涵有无胜义，其本身显示之物象，多为当时礼俗所尚之片断史影，对考察其时政教、民俗、美术以及历史断代等方面，具有参考价值。要以造型精良、文义美妙，为历代鉴赏家所珍视，因有“铜版画”之誉，千百年来著录不绝。至古佚钱谱内容，已不得其详。传世古谱著录花钱，以宋洪遵《泉志》一书为最古。洪志内分九类，压胜钱殿后，可知花钱入谱由来已尚矣。其后，钱币谱录之作不遗压胜类钱，但著为专书者鲜。《中国花钱》一书，博采诸家珍藏，益以著者自藏精品，选录钱拓二千二百余事，系以解说文字万余言，统分为：（一）无字花钱、（二）吉语花钱、（三）钱文花钱、（四）生肖钱、（五）神灵仙佛花钱、（六）棋钱马钱、（七）异形花钱和附录邻国花钱等八类。编者精鉴赏，长于选钱，内容质实多彩，固毋须待言也。

日前徐、余二君来函，恳促为其书制序文。予与之交且十载，时有过从，谊不可辞。唯序跋诸作，最不利于无专门之学而为文，大儒顾亭林先生更有“人之患在好为人序”微语。自惭失学无文，岂可复蹈昔贤告诫。兹以友情难却，作序不敢当，谨述所闻以为弁言云。

王 贵 忱

概 说

我国古代钱币，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。其品种之繁多，为世所罕见。除了大量的流通货币外，还有许多一般不作通货使用的铸品，或为官炉，或为私铸。大者如盆盘，小者似鸡目，有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、铅以及其它各种质料，精粗不一，形状多样。有的有图案有文字，有的只有图案没有文字，也有的只有文字，而无图案花纹。宣森在《为厌胜钱正名》一文中将它们分为纪念品、厌胜品、凭信品、上梁品、供养品、博奕品、吉语品、成语品、戏作品等九个品类，看来还不止这一些。历代钱币谱录对这些非正用品早有著录。如萧梁时的顾烜，在其《钱谱》中曾引用了我国最早的一部钱币书——《刘氏钱志》的四种钱：两铢钱、星月钱、四五钱、八星钱，除“两铢”外，似乎都不是正用品。《刘氏钱志》及《顾烜钱谱》虽均失传，但现存最早的古钱专著南宋洪遵《泉志》中尚有引录。可见，各种非正用品的钱币，在我国钱币学产生之初，即已引起钱币学家的重视。

从洪遵《泉志》到丁福保《古钱大辞典》，各种非正用品钱币多数列入“厌胜类”。古代厌、压相通，所以又称“压胜钱”、“押胜钱”。

现存最早记载“厌胜钱”及其得名由来的，是北宋《宣和博古图》。书中提到：“李孝美《图谱》有永安五男钱……孝美号之曰‘厌胜钱’。”但李孝美是因为梁顾烜《钱谱》及唐张台《钱录》所纂有舛错，才增广成为十卷《历代钱谱》的。由于顾、张、李三家著作都已亡佚，故究竟是宋李孝美，还是唐张台或梁顾烜最早提出“厌胜钱”之名称，已无法查证了。厌胜之原义，乃是所谓“厌伏其人，咒诅取胜”之意。汉代已有使用星相方位、制作器皿及祝诅等厌胜之术，来威慑镇压对手。早期的厌胜钱，也是以厌攘为目的而特制的钱形迷信物。通常除文字外，还在背面（或两面）铸有各种图案，如星斗、宝剑、四灵图案等等。可能后来引伸为有图案的都称为厌胜钱，再后来，则把许多非正用品钱币都称作厌胜钱了。如邱思达《古钱百咏》就将“用作馈赠、玩赏、配饰、卜卦、撒帐、洗儿、殉葬、宫灯坠、棋子和系包袱用的，凡此种种”都归入“压胜钱”中。宣森在《为厌胜钱正名》一文中认为：“已往钱谱列入厌胜类中的多数钱币，其用途与‘厌胜’是毫无关系的。”因此“名实不符，难以用‘厌胜’概之”。至于究竟应以什么名称来称呼之，钱币界存有多种意见。

彭信威在《中国货币史》中曾指出：“中国货币的形制和西方货币截然不同：西方货币上喜用人物禽兽花木为图形；而中国货币上，除文字外无它物。甚至如果中国钱币上发见有飞鸟走马，大家就要研究它到底是不是正用品。”正因为许多非正用品有各种各样的图案花纹，是与仅有纪重、纪值、纪年、纪地（局）、纪国号、纪年号、纪用途等钱文为主的流通货币的最大区别，因此，有人称之为“绘钱”，日本即有《绘钱谱》刊行。另外，也有称作“画

钱”的。不过，宣森在《为厌胜钱正名》一文中对此名称并不满意，认为“对一些无画的却又不够确切了”。

台湾的集币界则把这些“举凡非为金融使用所需而铸造的钱币”统称为“玩钱”，如陈鸿禧即有《玩钱集》行世。他认为玩钱所包含的内容更广，有可能是古代铸的，也可能是近代铸的，包括近铸、近作、近伪等一切铸来赏玩的钱币。宣森《为厌胜钱正名》一文对此名称亦不满意，他认为：“用‘玩钱’名之，似乎贬低其价值，而且‘玩赏’也不能概括不少非玩赏者。”但宣森自己也没有提出一个更好的名称来取代它。

郭若愚在《吉祥钱的母钱和样钱》一文中，对这些非正用品提出了一个新的称呼。他说：“吉祥钱，旧称厌胜钱，这个名称太老，也不能弄清它的含义。或称玩钱，也觉不甚确切。日本称绘钱，说明其现象，没有说明其实质。我因其铸有吉祥语及吉祥物，不如称之为‘吉祥钱’。”不过，非正用品上所铸的内容，看来也远不止是吉祥语及吉祥物所能概括。

台湾钱币学家蔡养吾在《中国古钱讲话》一书中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名称：“杂钱”。他说：“或因这一类钱币，每以绘镂雕刻为主题，日本人名之为‘绘钱’。也有以其系供欣赏把玩用的，而称之为‘玩钱’，认为……它终归似钱而非钱。”但是，“在某种情况下，这些玩钱，也可在一定范围内作价流通，和常钱具有同等效用”。“只是与无限通行的官钱有所区别，而与‘私钱’、‘贼钱’则没甚么差别，不宜遽然谓其似钱非钱，贬之为‘玩钱’，名之曰‘厌胜品’。似乎改称‘杂钱’较为切题。”他还对‘杂钱’这个名称作了解释：“所谓杂钱者，言其流品复杂，条件驳杂，功用混杂之意也。”不过“杂钱”这个概念，往往是相对于官炉“制钱”而言的。如果杂钱和“私钱”、“贼钱”没有什么差别，岂不是私钱、贼钱也可归入“杂钱”一类了吗？显然作者并无此意。因此，这个名称目前尚未为一般钱币爱好者所广泛接受。

对这些非正用品还有一种名称，那就是“花钱”。花钱这个名称的出现，还是比较早的，最初可能仅仅指有花卉图案的钱品。如清乾隆时期梁诗正等《钦定钱录》在列举两枚有四花朵纹之镂空钱后称：“右二种旧谱谓之花钱，并空镂二面与前同，意皆撒帐钱也。”嗣后，其它花纹之镂空钱，如龙形、凤形、鹿形、雀形、鱼形、人形等亦统称为通花钱。清同治年间王锡荣《泉货汇考》就提到：“以上镂空钱……俗呼玲珑钱，亦称通花钱，盖因其两面通透而名。”除镂空钱外，其它铸有各种花纹图案的钱币也被人称之为“花钱”。如太平天国所铸的大“礼钱”，因有二龙抢珠、八宝图案及双凤图案，当时就以“花钱”称之。李秀成之弟李明成在1861年书致英国翻译官福礼赐的文书中，即有“敝国圣钱，今已办上大花钱壹元，敬呈麾下取玩，以表友情。”这种大花钱，一般认为是当时特命铸造用以赐赠的纪念钱币，乃是官炉所铸。后来，民间各种有花纹图案的钱币，也均以“花钱”相称了。如王锡荣在《泉货汇考》“凡例”中即曾提到：“厌胜钱如大泉五十、大观、泰和等花钱，乃后人借用年号铸以厌胜，未必当时所铸。”

可能有人会说，有图案花纹的非正用品称之为“花钱”，名符其实，但是还有许多只有文字并无图案花纹的非正用品，称其为“花钱”，是不是有点名不符实了呢？其实，所谓“花钱”之称，可以有两层含义：一层就是有图案花纹；另一层则是指相对于“正用品”而言的“非正用品”。我们在习惯上，把相对于正色的，称之为“花色”；相对于正腔本调的，称之为“花腔”；相对于正帐的，称之为“花帐”；相对于正经实话的，称之为“花言巧语”；相对于正道

的，称之为“花花路子”，等等。因此，相对于正式流通货币（正用品）而言的那些五花八门、花色品种繁多的非正用品，称之为“花钱”，也是十分顺理成章的。

当然，把那些包括有花纹的及无花纹的各种非正用品都称之为“花钱”，开始主要还是广大钱币爱好者之间使用，并未见之于何种辞书或谱录。但是叫的人多了，也逐渐地为大家所接受。有时遇到一些只有文字没有图案花纹的非正用品，大家在争论不休之时，一句“这是花钱”，顿时便解开了疑团，得到认同。钱汝虎在1984年5月18日《上海物资市场》报“货币丛谈”栏发表了《推陈出新说“花钱”》一文，明确把过去称之为厌胜钱的非流通钱币用“花钱”这个俗称来称呼之。文中既提到《南史》所载齐世祖萧赜幼时“得圣钱，文为‘北斗星’、双刀、双贝及有人物带剑焉”的有图案花纹的花钱，又有引《三国典略》北齐文宣帝即位时“广宗郡献瑞钱曰‘归于圣帝’”的无图案花纹的花钱。钱汝虎的文章后来还收入了由朱卓鹏、马传德等编著的《钱币漫话》一书中，为广大读者所认可。另外，如陈观纯在1988年第2期《舟山钱币》所刊出的《乾封泉宝花钱》一文中，也把并无图案花纹的“乾封泉宝”背“福德长寿”吉语大钱称之为“花钱”。特别应指出的是钱币学家马定祥先生对此说也表示认可。他在1989年为“西湖十景”币形章所作“序文”中即提到：中国历代钱币中，“‘花钱’（泉家泛称厌胜钱）更具艺术特色。溯自汉有厌胜泉类以来，历代帝王之赏赐钱、纪念币、章暨官炉或民铸之生肖钱、打马格泉等……纵非正式通货，但其文字图案因能反映当时之民间风尚，故独立成一体，而为研考历史文物与钱币收藏家搜罗之对象焉。”

因此，综观以上几种关于历代所铸非正用品钱币的名称，虽然各有各的道理，但我们觉得“花钱”这一称呼更为通俗易懂，雅俗共赏，能够概括全貌，故将书名定为“中国花钱”。

下面，对我国历史上五花八门、品种繁多的各类非正用品的花钱，作一点简单的介绍。

镇库钱 这是一种官炉钱局在开铸流通钱币之前，为镇钱库之邪恶，特意铸造的特大型超重钱。有的在钱币上铸有“镇库”字样，存世最早的为南唐“大唐镇库”大钱，清代咸丰年间宝泉、宝源两钱局所铸有“镇库”字样的大钱亦有发现。但历代也有不铸“镇库”字样，实为镇库性质的大钱，如北宋鎏金“大观通宝”特大钱、明朝“万历通宝”特大钱以及多种“太平天国”背“圣宝”特大钱等。镇库钱一般制作精美，存世极少，故非常名贵，于是有人专门伪造镇库大钱。据马定祥先生见告：《古钱大辞典》所载的最大一品钱图“咸丰通宝”背“大清镇库”钱即为伪品。

开炉钱 指历代钱局（监）在正式铸造前，先精工铸制的一批带有纪念性质的钱币。它们不仅比普通钱厚重，有的还铸有吉祥文字或图案，以用于祭祀神灵，迎祥纳吉，或进呈上司，以图邀宠。故开炉钱一般都铜质优良，精美别致。如背为祥云凤鸟图案的水波纹外缘“顺天元宝”，为唐时史思明所铸的开炉钱；背双龙图案的“崇宁重宝”，为北宋徽宗时的开炉钱；“试铸大吉”光背和背满汉文“宁”字钱、“太平重宝”背“宝陕钱局”钱以及缘有凸纹双龙抢珠图案的“咸丰重宝”宝苏局当五十钱等，则是清代的开炉钱。太平天国大花钱亦具有开炉钱性质，因用于赐赠，又称“大礼钱”。

雕母钱 又称祖钱，系工匠手工雕制而成，供皇帝、上司裁决或用来进行翻铸的钱型。其制作材料多种多样，如象牙、玉石、木质及铅、锡、铜质等。因存世十分稀少，且与钱

制有关，历来为钱币藏家所重。现存最早的铜质雕母钱为南京博物馆藏“嘉靖通宝”当十大钱。罗伯昭曾藏“咸丰重宝”宝河局当五十枣木雕母，已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。另外，厌胜、吉语品亦有雕母钱存世，如马定祥先生所藏“大清万年”背“暗八仙”图案红铜雕钱，郭若愚所藏“天下太平”背“长命富贵”黄铜雕钱等。

宫钱 指专供皇宫内节日庆典装饰、挂灯、上梁、赏赐等用途而特制的官炉铸品。

挂灯钱 宫钱的一种，作宫灯坠用。据《大钱图录》载：“钱局岁十二月例精铸制钱若干缙呈进，谓之挂灯钱。”有些比常用制钱要大，而且铜质精良，制作精美的年号钱，有人误认为折二型、折五型者，可能即是这种挂灯钱。

万寿钱 宫钱的一种。皇帝的生辰称为万寿节，钱局往往铸精美的“万寿钱”以呈进。南宋“福宁万寿”金钱，王荫嘉认为是宋孝宗时为太上皇帝八旬万寿所铸。“绍定万岁”银钱则铸于宋理宗绍定年间。清“光绪通宝”背“福寿”钱，据蔡养吾认为，乃是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铸的万寿钱。

祝圣钱 宫钱的一种，每逢年节或国家庆典之时由钱局特铸呈进。清乾隆以前，多有龙凤花纹。乾隆以后，逐渐以文字代替花纹，背多书吉语颂辞，如“天子万年”、“人寿年丰”、“国泰民安”等。“嘉庆万年”背有“五世同堂”、“十全老人”等颂语者，当为嘉庆初年为太上皇帝乾隆所铸。《大钱图录》所载背均为篆书“宝泉”，面为隶书“一道同风”、“二南雅化”、“三星拱照”、“四海升平”、“五谷丰登”、“六府孔修”、“七政齐衡”、“八音克谐”、“九功惟叙”、“万国来朝”十品一套者，“传闻为内廷需用之品”，当亦属祝圣钱。

包袱钱 清代宫钱的一种。为祀历代帝王的奉先殿上所用，祭祀品皆以黄缎为袱衬之，各袱四角都缀一大铜钱，面文同于常钱，背文为“天下太平”四字，故亦称“太平钱”。每逢皇帝即位时由官炉铸造，死后即改换新钱。自乾隆至宣统列朝都有，以道光、咸丰为最多，宣统为最少见。

赏赐钱 为皇帝或掌政者赏赐给大臣、部僚的钱币。特制的赏赐钱有金、银铸品及鍍金者，其制作精美，一般不作流通使用。唐代皇帝赐“开元通宝”金银钱，屡见史载。宋代宫中亦有大量金、银赏赐钱。至明代，仍有皇帝“撒金钱赐诸学士”的记载。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四川成都建立大西国后，亦曾铸过金、银、铜三色“西王赏功”钱，以赏赐有功的部将。各种特制的赏赐钱，今均已十分罕见。

洗儿钱 据《资治通鉴》载：杨贵妃收安禄山为干儿子，唐玄宗“自往视之，喜，赐贵妃洗儿金银钱”。可见“洗儿钱”为贺人得子时赏赐或赠礼所用，特制者亦为金、银铸品。

吉语钱 凡铸(刻)有吉利祝语的花钱，均可称吉语钱。官炉、民铸均有，品种极多，形状各异。上述开炉钱、万寿钱、祝圣钱、包袱钱等，有不少均可视为吉语钱。所谓成语钱，亦可归入吉语钱类。

祝寿钱 吉语钱的一种，为庆祝寿诞之用。钱文有“龟龄鹤寿”、“龟鹤齐寿”、“福德长寿”、“福寿延长”、“千秋万岁”等，背或为神仙、灵龟、仙鹤、瑞云等图案。另外，“大明弘治年造”背“寿”字银饼、“崇祯通宝”背穿上“寿”字钱等，当亦是祝寿钱。

佩饰钱 指古人佩于身上作装饰用的钱形铸品。亦称佩钱。佩钱起源于汉代，原为钱形带扣，后在其上增添各种图案或吉语，如“日入千金、长毋相忘”，“予天毋极、宜子保孙”

等；或将名号铸于钱上，如“太常半两”、“威偃半两”等。早期的铜扣及佩钱穿孔常呈菱形，使系带后仍可保持文字的上下位置。后世各种圆形圆孔花钱，往往亦可作佩钱使用。有人认为镂空钱亦是一种佩钱。还有一些佩钱，除钱形外，上部还有环扣等附加物。

避兵钱 汉代佩饰钱的一种，两面分别为“避兵莫当”、“除凶去殃”。洪遵《泉志》中即有记载。实物有上下均连环扣者。

雅玩钱 佩钱的别称。铸有“文星高照”、“状元及第”等吉语及魁星等图形的，称魁星钱；铸有台阁人物图形的，称台阁钱；铸有诗文的，称诗钱；铸有“一帆风顺”、“一路福星”等吉语及帆船等图形的，称行旅钱。有种雅玩钱，两面分别为“一色香花红十里”、“状元归来马如飞”的诗文及图案，画面布局匀称，人物形象生动，制作十分精美，是一幅科举时代具体、形象的风俗图画。

春钱 古代民间用作首饰的小钱。多系私铸。质地或用金银。据《闲居录》记载：“至大改元，妇女首饰皆以金银作小钱戴之，谓之春钱。”可见起源于元代。有种“新春大吉”背“人口平安”等小型铜质吉语钱，或许亦作春钱之用。

撒帐钱 古时在婚嫁仪式中使用的钱形铸品。撒帐钱上多铸有吉语祝辞，如“长命富贵”、“夫妻偕老”、“金玉满堂”、“早生贵子”等。据《泉志》引旧谱称：唐“景龙中，中宗出降睿宗女荆山公主，特铸此钱，用以撒帐”，其钱文为“长命守富贵”。宋代盛行果钱兼用，吴自牧《梦粱录》有“凡男女对拜毕，再坐床，礼官以金银盘盛金银钱彩钱杂果撒帐”的记载。银钱乃以白银铸之，金钱则多以古钱鍍金而成。然后世亦多有仿铸者。

秘戏钱 钱上铸有简陋的男女合欢图形。查汉代石刻及唐镜中即已有此类图形，故秘戏钱的出现大概不会迟于唐代。除图形外，有的还有文字如“风花雪月”、“明皇御影”或历代钱文。可能是旧时长者授于新婚子媳作为传授房事以求子孙绵延之用。也有称其为“避火钱”的，所谓“火神乃是腼腆少女，见嫁妆中藏有此物，即羞惭而退，不复为灾”，这当然是无稽之谈。

凭信钱 作为凭证或信物使用的钱币或钱形铸品。《汉书·王莽传》有“始建国二年，吏民出入，持布钱以副符传，不持者，厨传勿舍，关津苛留，公卿皆持以入宫殿门，欲以重而行之”的记载，这种“布钱”即是当“通行证（符传）”使用的钱币。但“布钱”为何物尚有争议，或认为是方孔圆形的“布泉”，或认为是王莽“宝货制”中的“布货”，也有人认为是上圆下方的“国宝金匱直万”。这些姑且不论。而南宋初年刘光世为招纳归附金兵所特铸之金、银、铜三色“招纳信宝”钱，则是世所公认的凭信钱。再如清咸丰年间天地会支派金钱会所铸之“金钱义记”以及浙江天地会所铸之“天朝通宝”背“永”、“皇帝通宝”背“圣”、“太平通宝”背“文”、“开元通宝”背“武”等，则为天地会之凭信钱。义和团运动期间天津义和团之坎字团所铸的“水陆平安”钱，也属凭信钱一类。

行乐钱 西汉王公贵族饮酒作乐时的钱形游戏品。一九六八年在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一套四十枚钱币，其中二十枚铸有“第一”至“第二十”记数文字，二十枚为“圣主佐”、“饮酒歌”等阳文韵语字样。经考证，认为乃是西汉宫中行乐钱。《历代古钱图说》“秦钱”部分有“第十”背阴刻“逢贤”等钱种，被称作“皆为秦初权钱，面文记数”，但与窦绾墓出土物相对照，当为同一时期同一用途之物。有人认为“第十”背阴刻“逢贤”钱“真伪可疑”，而马定祥先生认

为此钱不假。

棋钱 为古代钱形的象棋子。象棋到宋代才完全定型，成为今日之形制。宋代的象棋子，官中行用的，有牙质。存世多为铜质，或为无孔圆钱形；或为方孔圆钱形。无孔圆钱形者或为两面汉字，或为一面汉字、一面图形。方孔圆钱形文字及图形在同一面上，传世尤少。

打马格钱 北宋时期兴盛起来的一种博戏工具，俗称“马钱”。李清照曾称其为“小道之上流”、“深闺之雅戏”。她在《打马图序》中叙述打马的源流道：“打马世有二种，一种一将十马者，谓之关西马；一种无将二十马者，谓之依经马，又宣和间，人取二种马参杂加减，所谓宣和马也。”钱上或铸有马形马名，或铸有骑马将军及将军之名等。《事物纪原》一书则介绍了一种打马的玩法：“打马用铜钱或牙角为钱样，共五十四枚，上刻良马，布图四面，以骰子掷打之。”传世马钱品种甚多，有的还是宋元时物，但后世亦有仿铸者。

卜戏钱 金元时期的钱形博戏工具。如“泰和小打”背“君子卜戏”钱，宣古愚曾有诗云：“折二仍名小打奇，泰和遗制费疑猜。莫言君子皆知命，也把金钱暗掷来。”然既称小打，或许与“打马格钱”有近似的博戏方法。

选仙钱 宋代以来的博戏工具。北宋王珪《宫词》云：“尽日闲窗赌选仙，小娃争觅到盆钱，上筹须占蓬莱岛，一掷乘鸾出洞天。”选仙钱有方形与圆形两类，圆形又分有方孔与无方孔两种。所列仙人，有王母、诗仙、散仙、酒仙等，背面均为一首五言绝句。故《泉货汇考》称作“诗牌品”。

灯谜钱 打灯谜是一种传统的娱乐活动。灯谜指贴在灯上的谜语，但也有贴在墙上或挂在绳子上的。有趣的是，曾在马定祥先生“万拓楼”集拓中见一方孔圆钱拓本，一面为“三九开河”，一面为“打古人名”，显系一则灯谜。这种铸有灯谜的古钱，不妨以“灯谜钱”相称。

戏作钱 工匠在铸钱时有意制作的游戏品，种类甚多。如把“天启通宝”、“崇禎通宝”钱仅取其一字，铸成“天天天天”、“崇崇崇崇”钱等。在清代亦有把背面的满文铸到正面来，与“通宝”对调等，钱币界也称之为“割裂钱”。

借“口”钱 民间所铸的趣味钱。如面文作“佳五矢止”四字，共借用穿口，即成“唯吾知足”。版式甚多，有楷书光背者，有篆书背“纫佩”者，亦有玉雕之篆书背满文者。“唯吾知足”可以看作是一种“座右铭”，一般认为其意乃“唯有我知足，知足者常乐”。亦有人根据天地会史料，认为有的可能是天地会首领佩扣衣衫所用，其意为天地会内之秘密，“唯吾知，足也”，严禁外传，以防后患。近见新铸借“口”钱，面文“五未矢止”，共借穿口成“吾味知足”，其含义已不同于前者。

刻花钱 所谓“刻花”，指在钱币上进行再加工，雕刻各种图案花纹。唐代开元钱即有刻为莲花纹者，有的还有鎏金，或作婚礼中撒帐钱用。明清时期流通钱亦多有刻花者，一般取万历、泰昌、顺治、康熙、嘉庆等吉利喜庆钱文，在钱缘、钱肉刻制花纹。康熙罗汉钱铜质精良，刻花者尤多。咸丰大钱亦多刻花者，有的花纹还刻得相当精细。也有将外缘雕锉成几何形花纹的，台湾有人称其为“毛雕钱”，以阔边的宝昌局咸丰当五十为多。于是，原来的流通货币，变成了退出流通领域的“花钱”。另外，也有在吉语佩饰钱上加刻各种图案花纹，使其更显精美别致。

连体钱 异形钱的一种。指铸成两枚横列叠压形状的钱币，多见于清钱，面“光绪通宝”背“福寿”连体钱即为一例。“钱”古称为“泉”，而“泉”与“全”同音同声，因此“福寿”连体双钱即含“福寿双全”之寓意。异形钱种类十分繁多，不胜枚举。

生肖钱 唐宋以来历朝有铸。有一种生肖为一钱、十二枚为一套者，有几种生肖合一钱者，亦有十二生肖全铸于一钱者。后者多为大钱。有的背有“长命富贵”、“天下太平”等吉语文字。背八卦图形者，亦称“八卦钱”。背本命星官者，称“本命钱”或“命钱”。还有张天师驱鬼、龟鹤齐寿、加官进禄、降龙伏虎等图案。其种类繁多，有不少属于道教祈禳用钱。

寿生钱 生肖钱之一种，一套十二枚。《古泉汇》称“库钱”。一面铸本命星官与所属生肖，一面铸十二相属各支该纳寿生钱若干及所属库别的文字，或亦为道教祈禳用钱。

延命钱 道教祈禳用钱。传为建“消灾延寿醮”所用，也称“保生钱”。样式颇多，钱文有“长生保命”等字样，图像有保生大帝、日月星辰、灵芝醴泉、仙童灵禽等。亦有为左右两神、上七星、下一兔作捣药状者。

四神钱 早期厌胜钱。四神之说最早见于周代，是星象二十八宿的概括，即东方七宿曰青龙，西方七宿曰白虎，南方七宿曰朱雀，北方七宿曰玄武。龙虎雀龟为四神，或说起源于古时图腾崇拜。秦汉之时，四神形象成为常见的艺术题材。后来铸此四神图案于钱背的钱币称“四神钱”或“四灵钱”。亦有铸成星剑龟蛇等四种法象者，更有仅为星剑图形者。这些厌胜钱面文有“除凶去殃”、“驱邪避恶”、“雷霆号令”以及“大泉五十”、“五行大布”、“永通万国”、“常平五铢”、“永安五男”等。或系道教用作驱魔伏邪之法物。

降魔钱 亦为道教驱魔伏邪之法物。较四神钱晚出。钱上有“玄天真武大帝”之像，上绘北斗，下有龟蛇，背或为灵符神咒，或为“降魔伏邪”、“真武灵应”、“玄天大帝”等文字。明代崇尚“真武”之神，故传世降魔钱以明代为多。

避毒钱 五月五日俗为“五毒日”，汉晋之世，以艾虎、蒲剑、钟葵、玉斧以驱毒物。唐以后又有画钟馗像以驱毒辟邪。避毒钱种类、式样颇多，钱文有“五月五日”、“诸邪回避”等字样，图案有钟馗、张天师等形像及五毒（蛇、虎、蜥蜴、蜘蛛、蜈蚣等）图形。

符咒钱 道教祈禳用钱。种类甚多。如“天罡咒钱”咒文为：“天罡天罡，斩邪灭亡，吾有令剑，斩鬼不存。急急如律令。”“太上咒钱”咒文为：“天圆地方，六律九章，符神到处，万鬼灭亡，急急如律令。”“五雷钱”咒文为：“雷霆八部，诛鬼降精，斩妖辟邪，永保神清。奉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，敕。”背面均绘有八卦、仙人、太上老君或雷部正神等形象。另外，“符印钱”，面为符文，背为星官及生肖图形等。“虎符钱”，面文书符上作虎头，背有人物“扬旗按剑势若擒捕鬼物”之状，或亦为星官及生肖图形。各种道家符咒钱，亦以明清之物为多。

禄马钱 道教祭禄马时所用之仿钱铸品。所谓“人之一生富贵穷通，皆由禄马主之，禄马健旺则财运亨通，禄马若倒人必死亡”。而祭禄马之目的则是求化凶为吉，遇难成祥。钱上均有一鹿形或马形，配以星月、灵泉、仙人、童子等。背文有“长命富贵”、“合家平安”、“吉星高照”、“元亨利贞”等祝词。传世品亦多为明清时物。

占卜钱 以制钱六枚置竹筒中，祝祷后摇动竹筒然后将其倒出并排列成行，视六枚制

钱的背和字的排列次序，以推测吉凶，叫“金钱卜”，又叫“金钱课”。亦有特制的占卜用钱，钱文作“阴阳神灵”、“灵通感应”等。如《明朝小史》载：“英宗北狩时，每筮决于山西同寅，屡验。复位召官之，辞不受，乃铸阴阳神灵钱以赐之。”另有一种小型占卜钱，面书“易卜”，背为八卦图形，为清代铸品。

上梁钱 为建筑工程方面所使用的厌胜钱。民间建房造屋，往往采用“太平”、“顺治”等吉利钱文行用钱作上梁钱，但亦有特制者，宫中还有金、银所制者。如明《张太岳文集·杂著》提到：“皇城北苑有广寒殿……万历四年忽自倾圮，其梁上有金钱百二十文，盖镇物也，上以四文赐余，其文曰至元通宝。”这些“至元通宝”金钱，当为元世祖至元年间营建广寒殿时的上梁钱。前些时候在北京景山北麓寿皇殿，发现正脊中间安置一锡宝盒，内有面、背分别为汉、满文“天下太平”的鍍金银钱二十四枚，则是清代之上梁钱。《大钱图录》载有一品“光绪通宝”背八卦图案大钱，并谓：“每遇修葺，各宫殿上梁时安置宝合（盒），合（盒）中皆贮此钱。”民间还有将上梁钱铸成刀币、布币形状的，如莽刀形状的“咸丰辛亥福州重建”背“圣庙正殿上梁用”及莽布形状的“咸丰元年十二月初四日己时”背“圣庙正殿上梁”，即是清咸丰初年福州重建圣庙时所铸的两种别致的上梁钱。

镇水钱 或谓建造堤防等所用。钱面为周处斩蛟或钱王射潮的图形，背或为吉语祝辞、八卦灵符等。

八仙钱 铸有道教八位神仙：铁拐李、汉钟离、张果老、何仙姑、蓝采和、吕洞宾、韩湘子和曹国舅之名号、图象及法器的套子钱。多为明清时物。

庙宇钱 自佛教传入中国后，由于统治阶级大力提倡，广建佛寺，遍造佛像，信徒日众。与佛教相关的仿钱铸品亦应运而生，俗称“庙宇钱”。礼佛供品的专用钱称“供养钱”，又名“香火钱”；置于佛像空腔中象征佛之脏腑者称“佛脏钱”；寺庙落成或新佛像塑就时的开光法钱称“庙祝钱”；铸有“阿弥陀佛”或“南无阿弥陀佛”者，称“念佛钱”；铸有“南无妙法莲华经”等文字者，称“念法钱”；钱文作“唵嘛呢叭咪吽”者，称“明咒钱”。亦有铸有佛像及佛号者。但民间有将“观音佛祖”与“天后娘娘”等铸为一套的，则属佛道不分了。

冥钱 古代死者入葬时伴以入土的仿钱制品，以供死者在泉下“花费”。有泥质、陶质、铅质、铜质及金、银质等。汉代的泥金饼、泥半两、泥五铢，新莽的铅质“大泉五十”阴文反书钱，北周时的陶质“五行大布”，以及辽重熙铅钱，宋庆历、淳祐铅钱及元至正铅钱等等即为例证。明十三陵出土的大批金质冥钱十分引人注目，而洛阳明墓出土的阴刻“消灾解厄”背“永寿延福”金冥钱，则为近年的考古新发现。直到民国初年，如面“太平通宝”背“福寿双全”一类铅质冥钱仍然在作陪葬之用。有些专为殉葬而用的钱币，上面铸有落葬纪年文字，如辽“大康六年”、“大康七年”、“清宁二年”等，被称作“瘞钱”。这种“瘞钱”，对考古研究很有价值。

当然，上述花钱仅为述其要者，还有种种其它类别与名称，这里只能从略了。

作为各种非正用品的花钱，虽然在特定的条件下，有时也被掺杂在流通钱中混用，但正如前述，它的主要职能并不是通用货币，因此，在货币史专家眼里，它的地位是不高的。清戴熙在《古泉丛话》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藏钱以足补史传之缺者为贵，故异钱可考者上

也，无可考者次也，厌胜下也。”彭信威在《中国货币史》专著中引用了戴熙这段话，并认为：“所谓无考者次要的话虽值得讨论，但贬低厌胜品的重要性，应当说是正确的，至少对货币来说是这样的。”赵汝珍在《古玩指南》中也强调应按照古钱的定义，即“历代中央政府及著名地方政府所铸造而发行之钱币且能通者”，把各种非正用品与历代行用钱区分开来。

那么，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些非正用品呢？马定祥先生曾多次对我们讲过：对待“花钱”，我们不应以“货币”视之，而是应该以“文物”视之。文物者，乃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其价值的东西。而历代的花钱实物，其文字与图案内容丰富多彩，涉及历史、地理、宗教、神话、风俗、民情、文化、娱乐、书法、美术、工艺制作等等各方面的内容，是一个可供研究发掘的宝库。

各种镇库钱、开炉钱、雕母钱等，本身就与历代钱币铸造制度密切相关。

各种纪年上梁钱、纪年祝寿钱、纪年瘞钱等，有其重要的考古实用价值。

不少花钱，如南宋抗金之战时刘光世所铸的“招纳信宝”三色钱，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时所铸的“替天行道”背“保清灭洋、庚子”钱和“水陆平安”钱等等，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实物见证。

而张献忠的“西王赏功”三色钱、太平天国大花钱以及“金钱义记”等各种天地会起义军的凭信钱等等，则是历代农民起义的珍贵历史文物。

各种厌胜钱、道教祈禳钱，诸如生肖钱、寿生钱、延命钱、四神钱、降魔钱、避毒钱、辟邪钱、符咒钱、禄马钱、占卜钱、八仙钱等等，以及佛教的庙宇钱、供养钱、佛脏钱、庙祝钱、念佛钱、念法钱、明咒钱、佛号钱等等，其数量极巨，在花钱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，是研究历史上民间宗教信仰与道教、佛教文化的实物资料。

各种官钱，如挂灯钱、上梁钱、万寿钱、祝圣钱、包袱钱、金银赏赐钱、金冥钱等等，则是封建王朝皇室贵族奢侈的宫廷生活之具体见证。应该指出，这正是建筑在对广大劳动人民大肆搜刮的基础之上的。

各种佩饰钱、吉语钱，诸如撒帐钱、缕花钱、祝寿钱、雅玩钱、诗钱、春钱、秘戏钱、冥钱等等，反映了古人在家居、出行、营生、迎考、寿庆、婚嫁、过节、丧葬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寄托着当时人们的愿望和追求，是研究古代民情风俗的一个重要内容。

各种游戏钱，如行乐钱、棋钱、打马格钱、卜戏钱、选仙钱、灯谜钱等等，则是古代人们文化娱乐生活的反映，是考证某些游戏活动历史发展的具体实物资料。

各种花钱的钱文，可以说是古代书法、文字的大汇集。真、草、篆、隶，各种书体齐备，内中不乏书法精品与名家手笔。一枚“百寿百福”钱，即包含了“寿”字和“福”字数十种不同书体的写法。另外，如“清白传家”的蝌蚪文、“泉货元神”的九叠篆文，道教的各种符咒文、天地会自创的凭信钱钱文等等，千奇百怪，举不胜举。除汉字外，还有多种少数民族的文字在花钱上出现，“大元通宝”背四体文钱即为一例。它们对研究我国古代的书法艺术和少数民族的文字，也有一定参考价值。

花钱上的图案花纹，是我国传统工艺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各种吉祥图案，以及动物、植物、风景、建筑，还有仙佛鬼神、将相百姓、男女老幼各式人物等等，都能在历代花钱上找到具体资料。即以动物图案而言，除十二生肖之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

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以外，在四灵钱、开炉钱、吉语钱、撒帐钱、镂花钱、雅玩钱、棋钱、避毒钱等上面，还能找到凤、鹤、雁、雀、鹿、麟、狮、象、驴、龟、鳌、鱼、蛟、蝙蝠、金蟾、蜈蚣、蜥蜴、蜘蛛……真是千姿百态，美不胜收。许多花钱，尤其是一些官炉铸品，由于其特殊的需要，往往不惜工本，其铸造工艺之精良，图案形象之生动，远非普通行用钱及一般民铸花钱可比，是优秀的古代工艺精品。

另外还应该指出的是，就在中国的货币文化对周围邻国发生巨大影响的同时，中国古代的花钱艺术也传播到周遭之国，不少邻国也仿铸、自铸了各种各样有图案花纹或吉语颂辞的花钱。这些邻国花钱，有的也在国内发现，它们已成为研究中外货币文化艺术交流的具体实物资料。

当然，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，历代花钱上的文字和图案，不可避免的打上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烙印，有的还有种种封建迷信色彩，可谓是精芜并存。因此，有待于我们加以批判地借鉴，吸取其精华，剔除其糟粕，以继承发扬，推陈出新。而我国现代新铸的种种纪念币、纪念章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可以说就是对古代花钱艺术的继承和创新。诸如：荣获国际比赛“最佳金币”和“最佳银币”奖的一九八三年版熊猫金币和熊猫银币、中国杰出历史人物系列纪念币、中国奥运会纪念币、十二生肖系列纪念币等，都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，已饮誉海内外。至于象“宝源局造”背“镇库”金币、“千里之马”金马钱、“好合百年”背分别为和、合二仙的铜章等，其本身就是古代花钱的仿铸品，给人以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的感觉。再如以杭州西湖风景为题材、名家书法及山水图画为内容的“西湖十景”币型章，亦是成功的一例。马定祥先生称它们“内涵诗情画意，高雅别致，格调新颖，图文并茂，不仅将花钱艺术推进更新境界，且对继承和弘扬中华货币文化具有高度之现实意义”。

种类繁多、琳琅满目的花钱，吸引了无数钱币收藏家和钱币爱好者，成为他们争相收集、研究的对象。历代古钱谱录，诸如颇有影响的宋洪遵《泉志》，明胡我琨《钱通》、益斋主人《货泉备考》，清张端木《钱录》、江德量《钱谱》、翁树培《古泉汇考》、梁诗正等《钦定钱录》、初尚龄《吉金所见录》、倪模《古今钱略》、刘喜海《古泉苑》、唐与昆《泉币汇考》及《制钱通考》、李佐贤《古泉汇》、鲍康《大泉图录》、许元恺《选青小笺》、张崇懿《钱志新编》、盛大士《泉史》、黄锡申《巽斋钱录》、王锡荣《泉货汇考》，以及近人丁福保所编之《古钱大辞典》等，对各种非正用品的“花钱”均有收录。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古泉学会之会刊《古泉学》及四十年代中国泉币学社之《泉币》双月刊中，也都有关于“花钱”方面的专题介绍及研究文章。诸如：介绍早期厌胜品的，有戴葆庭的《汉寿富钱》、郑家相的《汉厌胜钱》和《汉晋五铢厌胜之变化》、马定方的《货泉背宜官秩吉》、张季量的《大泉五十常乐未央》等；论述撒帐吉语钱的，有丁福保的《撒帐钱考》等；介绍官钱的，有王荫嘉的《泉纬丛谈》所述之“福宁万寿金钱”、罗伯昭的《金太平》等；介绍庙宇钱的，有李映庵的《至元通宝背玉》、张季量的《元贞小银钱》等；研究凭信钱的，刊出了翁宜泉的《招纳信宝》、刘祝封的《钱匪纪略》等；论述冥钱的，有方药雨的《说永昌福宝银钱》等。这些文章，对于我们继续开展对各种非正用品之花钱的研究，不无启迪。

进入八十年代,新的泉学研究高潮逐步掀起。各种“花钱”亦成了大家研讨的对象。在各种钱币刊物上,介绍、论述这些非正用品钱币的文章多不胜数。仅以《中国钱币》为例,即曾刊有智龛的《西汉吉语五铢钱》、李瀚的《关于厌胜钱的初步探讨》、杨成琪的《大元国宝铅质雕母样钱》、陈乃雄的《元四体异文钱试释》、孙仲汇的《元代供养钱考》、郭若愚的《八思巴文“权”汉文楷书“貳拾伍文”铅钱之我见》及《太平天国大花钱考》、谷潜的《义记金钱考》和余建顺的《我所知道的义记金钱》,以及马传德、马定祥的《义和团团钱》等等。另外,有关的出土报道,还有《五台山发现的淳化元宝金钱》、《浙江慈溪出土“隆兴通宝”金钱》、《北宋银质“太平通宝”钱》、《洛阳首次出土“万历通宝”银钱》等等。各地其它钱币刊物也有许多关于花钱方面的文章与报道,有的开辟了专栏、有的对一些疑难钱币张榜求释,有的还组织专题研讨文章,从而解决了一些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。

马定祥先生对花钱一直十分重视,他不仅收集的资料十分丰富,而且在研究方面亦有许多独到的见解。经过他具体的分析和考证,得出“重楞贵宝”钱是唐代行乾元重轮钱时所铸的结论,令人心悦诚服。在《飞龙进宝析》一文中,他第一次明确提出“飞龙进宝”是南汉刘谔的庆典钱之说,王贵忱、王大文的《刘隐和南汉铸行钱币考略》完全表示赞同。在《谈大型“大观通宝”钱》中,他明确指出:多见的特大型“大观通宝”合背铁钱为赝品,真品仅见为非正用品的鍍金铜钱;旋读“大观通宝”银钱为御赏钱;折十型背模铸八卦者为开炉钱,文字挺拔、传世甚少;折十型压胜品背模铸人物、动物、花纹、云纹、日月星剑、吉语等,又有面背带四出纹及重轮的,还有四周作六楞菱花形的,均为后铸。在《为佛像金币正名》一文中,他指明了淳化金币的庙宇钱性质,应为天子祭天时在庙中所贡之物,从而否定了“祭山”之说。在《象棋古钱》一文中,他通过对十分罕见的宋代棋钱的具体介绍,使人耳目一新。特别是在1983年出版的《太平天国钱币》专著中,他不仅全面介绍了太平天国的流通货币,并对太平天国的非行用品,诸如大花钱、镇库钱、吉语钱、民间刻花钱以及冥钱等作了分析和介绍;另外,还考证了“金钱义记”等多种天地会的凭信钱,从而填补了太平天国及天地会研究这方面的空白。该书出版后,他又对“洪武天下太平”背“圣旨、午人存、日月明”等天地会早期会钱作了精辟的研究,并准备在再版中加以补充。在《义和团团钱》一文中,他不仅将一枚被日本人误考为道光二十年所铸的“替天行道”背“保清灭洋、庚子”钱确定为1900年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时所铸的义和团团钱,而且还将以往被认作厌胜钱的“水陆平安”背北斗七星、刀叉图案及“坎”字卦文黄铜钱,恢复其义和团天津坎字团所铸之团钱的本来面目。文章发表以后,引起了海内外钱币界、学术界的关注。

马定祥先生曾一再申称,不要忽视“花钱”,不要忽视那些无考钱,还说,变无考为有考,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。他对那些非正用品“花钱”的研究和考证,为我们树立了榜样;他的谆谆教导,激励着我们继续努力去探索各种“花钱”之谜。本书的编撰,权充引玉之砖,以期能有更多的人到“花钱”这块天地里来共同耕耘,使“中国花钱”之花开得更为鲜艳,结出更为丰硕的果实。